

二元对立思维的文艺评价模式

——论左翼文艺运动对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9）的冲击

叶俊莉

（西昌学院 中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本文考察了左翼文学中文学评价标准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9）文学评价标准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形成，认为左翼文艺运动对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9）产生了重要的冲击。

【关键词】文学；政治；文艺评价；二元对立；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4-0049-05

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人们认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也出在文学与政治（革命）关系中，原因是“左联”之前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革命文学倡导者提出要做无产阶级革命的“留声机”。到了延安《讲话》，毛泽东明确提出文学要服从于政治、评价文学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后来经过左翼文艺阵营的发挥甚至要求文学服从于具体的政治任务和政策。这样的背景下，文艺评价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始终贯穿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9）。

左翼文学中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建构

左翼文学在其产生、发展过程，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文艺评论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所谓二元对立文艺评价，指文艺评论以政治为标准，一分为二，作家政治进步，其文学作品必定进步，体现出正确与进步的思想，这样的作品值得赞扬与肯定；相反的，作家政治思想落后，那么他的文学作品、文艺思想必然错误，作品会流露出作家错误与退步的思想，这应该受到批判与否定。

1927 年春夏，国民党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了，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和斗争的需要，1928 年 1 月，由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和蒋光

慈、钱杏邨等太阳社成员，共同倡导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们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如无产阶级文学应该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革命作家要努力获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等。同时，他们以此为文艺评价的标准，将文艺现象、文艺思潮作了一分为二的简单的划分，非白即黑：凡是没有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文艺作品，应当给以批判；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指导下的创作和作品，都是革命的、进步的。于是，他们曾一度把“五四”新文学当成了资产阶级文学而予以否定，将鲁迅、叶圣陶等作家当成了批判的对象，从而引起了新文学阵营内部历时一年多的论争。这也许应该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左翼文学中的最早体现。

1930 年 3 月 2 日，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左翼作家的影响、领导的加强。鲁迅、冯雪峰、沈端先等 40 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鲁迅在会上总结了革命文学时期的经验教训，肯定了革命文学运动，但反对倡导者们夸大文艺的作用，忽视文艺的特征等错误观点。作为一种“新兴文学”，左翼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与“五四”新文化（文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的变化不在于新语法的生成，而在于它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它意指着马列主义革命现代性追求，也

收稿日期 2006-09-06

作者简介 叶俊莉（1973—），女，四川西昌人，讲师，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研究。

标识了一种文学意识形态泛化的场景[1]。左翼文学带给人们的是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东西：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否定和对集体主义、阶级意识的崇拜，对浪漫主义的排斥和对现实主义的独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确立，由五四“平民文学”到“文学大众化”的提倡，由文艺“为人生”到文艺“组织生活”说以及半政治化的作家组织方式。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对五四文学的继承和深化，另一方面又是对五四文学精神某些方面的否定和扬弃。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的这些观念和主张，通过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的四次论战而得以确立，并在解放区文学和解放后的当代文学中部分地得到继承和发展。

“新月派”代表人物梁实秋认为文学要表现普遍的人性，用人性论反对革命文学的阶级论。左翼作家作了有力的回击。鲁迅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人就带有阶级性，梁实秋之流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从而戳穿了人性论的谎话及其阶级本质。继“新月派”之后，1930年，王平陵、朱应鹏等在国民党的指使下，发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扬民族主义是艺术的最高意义，文学要表现民族的意识。它立刻遭到左翼作家的反驳，揭露民族主义文学不过是以民族意识为招牌，抹杀阶级矛盾，以铲除革命文学的党治文学。1931年，以“自由人”自诩的胡秋原发表文章，宣扬“文艺自由论”以此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苏汶又以“第三种人”名义进行声援。瞿秋白、鲁迅、冯雪峰等纷纷发表文章予以反击。从这些论争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作家以马克思文艺理论为指导，倡导无产阶级文艺、强调艺术的战斗性的同时，陷入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其论辩基本上只停留在政治层面，没有进入到文学的深层问题，对论敌的一些合理意见也没有认真考虑。

“左联”的成立，大大密切了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推动了社会革命和历史进步，但由于忽视了文学自身的特性，并且在文艺评价上坚持“二元对立”，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1936年春，“左联”解散，但“左联”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此后二三十年间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延安文艺运动可以说是左翼文艺运动的继续。

1942年5月，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此次会议旨在解决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作家与大众的关系、文学的普及与提高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这是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思潮在40年代的最佳传承与发展。另外，《讲话》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这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文艺评价中的支配地位的最终确立给予了政治保障和原则支持。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解放区文学成为工农兵文学，“工农兵”以外的作品难以立足；现实主义成为唯一思潮，现代主义、浪漫主义都黯然失色；艺术方法和手法单一，缺乏丰富多彩和开放性，产生了某些公式化、概念化和图解政治的作品。这从实践上验证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解放区文学的全方位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二元对立的评价模式的再度实践。整风重点批评的对象是王实味，他强调文艺要暴露黑暗，其文章《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受到批评，且对他的批判逐步升级，最后错误地将他定为“托派分子”、“国民党探子、特务”，并在1947年延安转移途中被错误处决。（整风中同时受到批评的还有丁玲、萧军等人）

40年代后期，在积极传播、实践《讲话》的同时，左翼文学界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为理论依据、以延安文艺作为理想模式，对解放区文艺、国统区文艺两支队伍采取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评价态度：一方面高度评价实践《讲话》的解放区文艺创作。正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说的，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品，如歌剧《白毛女》、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受到郭沫若、茅盾、邵荃麟等的热烈赞扬（注：如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文萃》第46期，1946），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2年第10期，1947），以及郭沫若、茅盾对《白毛女》的评论等。）。另一方面，对40年代国统区的文艺状况基本采取清理态度，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们也顺应地检讨了自己。如茅盾的《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1946）、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1946）、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等。很显然，此处的区别对待将决定

在未来的文艺发展道路上孰轻孰重。

同时,左翼文学界还对40年代作家、文学派别进行了“类型”划分,分别确定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为“文艺新方向”的实施清除障碍。作家的“世界观”(主要指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他们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的态度,他们的作品可能发挥的政治效用——是左翼文学界划分文学力量的最主要的尺度。按照这一尺度,作家被划分为革命作家(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或广泛的中间作家)和反动作家三类。在1948年3月出版的,由邵荃麟、冯乃超等在当时的左翼文化中心香港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充满火药味地批判文坛上各种倾向:发表了署名“本刊同人,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和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在他们的描述中,革命作家与反动作家是相对的两极,被列入后者的有徐中年、顾一樵、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易君左、萧乾、张道藩等,以及色情、神怪、武侠、侦探等文学。对待“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左翼文学界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指出他们与左翼作家在反帝反封建的方向上一致,并有靠拢革命、走向人民的现实表现,但也指出不应忽视他们与“革命大众文艺”存在的距离,由此,对待他们应该“团结”),又有胡绳、乔木(乔冠华)等对左翼阵营内的胡风的文艺理论和路翎的小说进行了集中的清算。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另外几家进步刊物也一起配合对国统区有较大影响的作家创作进行了有计划的批评,被批评的作家有姚雪垠、骆宾基、钱钟书、臧克家、李广田等,范围相当广,相对照的是他们对解放区文艺创作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和肯定性的评价。到了40年代末,左翼作家内部划分出反动的一类,胡风、冯雪峰等成为被区分的对象。他们的文学观被指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实际上已被看作是左翼文学界的“异己力量”。

左翼文学主流力量所作的类型描述和划分,是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标准,实施二元对立评价模式的集中体现。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标志着现代文学开始进入当代文学。二元对立的评价模式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也将继续下去。

左翼文学的二元对立评价模式对当代文学(1949—1979)的冲击

左翼文学强调社会价值,重视思想介入文学,这是文学群体追求政治效应的必然结果,是文学成员政治参与意识强化的直接结果:“左联亚政治文化性特质决定了,左翼文学必然成为传输共产党亚政治思想体系、观念、意识形态的渠道,文学理论必然倡导文学功利价值为要义。”^[2]在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贯穿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9)文艺评价的始终,也统治着这一时期人们的思维、思想和生活。1949年7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能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都是属于“人民需要的人”^[3],许多在“五四”新文学发展中作过重要贡献的文学家被挤出大会,如沈从文、朱光潜等,他们曾被左翼作家点名批判,作为反动作家当然无权参加此盛会。周恩来说这是“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尽管他高度评价了来自这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解放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进入了部队,进入了农村,最近又进入了工厂,深入到工农兵的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已看到初步的成绩,在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坚持着自己的岗位,在敌人的压迫之下绝不屈服,保持着从五四以来的革命的文艺传统。”^[4]但从周扬和茅盾对两个地区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总结中可看出:周扬主要肯定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坚决实践了《讲话》规定的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茅盾的报告更重要的是检讨国统区文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倾向,特别是“批评了抗战时期捍卫‘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面旗帜胡风和团结在胡风周围的一些进步作家”,“很显然,两个地区、两种传统在未来文艺发展道路上所处的主次、轻重关系摆得非常明确”,这“预示了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国文学新阶段将由来自解放区战争实践的文艺传统为发展基础,同时也在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吸收‘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战斗力量。”^[5]从这样的差异,我们看到左翼文艺所倡导的二元对立思维评价标准在当代文学之初就已明显存在。

中国50、60年代文学,充满着文学论争演化成的大规模批判运动,它以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开始,到1954年、1955年,毛泽东亲自发起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和文学理论家胡风及其“集团”的镇压,可看作是其顶峰;50年代末期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批

判以及此后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批判,进一步扩大了批判范围;毛泽东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引,19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批判运动,“文革”序幕就此拉开。在这一系列批判运动中,往往由一般的文艺论争升级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波及范围之广出人意料,批判程度之深令人胆寒。这正是政治是文艺评价的第一标准这一精神的具体实践。于是,文艺评价离不开作家世界观、阶级立场,离不开作家作品的政治意义、政治价值。这时候的文学批评不是单纯的文艺批评,“而是体现政治意图的,对文学活动和主张进行‘裁决’的手段”^[6]。这种文学批评被赋予两个作用:“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6]这是二元对立思维在文学批评中的体现,它直接继承了左翼文艺思想。

这种文学批判的直接结果导致了五六十年代作家的不同发展轨迹。来自解放区、继承延安文学传统的作家和来自左翼文学阵营、长期配合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进步民主作家,成为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心群;那些曾经在历史上间接或直接地与共产党、或左翼运动发生过冲突的作家,他们的写作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类作家大多数都退出文坛,隐居民间不再进行文学创作,也有的转向其他领域的研究,如沈从文进行历史文物的研究,钱钟书放弃文学创作而转为研究古代文学等。这种作家的“整体性更迭”,既是五六十年代批判运动的直接后果,也是“左翼文艺力量在4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划分,以确立‘文艺新方向’的结果”^{[6] (P27)}。

与五六十年代的批判运动相互渗透的,是对一种新的文艺形态的构想,即“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在创作思想上和艺术方法上,“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强调“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尤其把“浪漫主义”重新阐释为“革命热情”加以突出。而以它们为指导思想的文艺创作,大都以工农兵为题材,充满政治激情,在当时的评论界、思想界及一般读者群看来,这样的作品具有正确的、进步的思想,是能为社会所接受的、值得肯定的。这种文学阅读、文学批评不再具有作为审美活动应当有的个性化、创造性和独立性的特点,它已变成一种公众行为,并且逐渐渗入了非文学的

(政治)因素。

在“文革”前三年,涉及文艺批判范围就已很广泛,在文艺理论、文艺创作方面进行了大范围批判,文艺创造者被要求具有工人阶级思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中对邓拓的《燕山夜话》、吴南星(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则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直接关联。“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文化战线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它的发生起源于1966年初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座谈会后形成的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面否定了建国以来的文艺界,重新阐述了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这种新文艺在题材的确立上,把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文学艺术只能反映社会主义斗争和建设,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生活。所有的作品在表现英雄人物时,要遵循“三突出”的原则,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文革文学”是对文学经典大规模批判颠覆的时代,是一个拒绝个性的文学时期,“革命”成为衡量文学的惟一尺度。“革命样板戏”是被官方大力提倡、影响最大的文艺形式,它在文艺观念上的根本任务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学成为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样板戏”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的摧毁、压制、改造和利用在文艺领域中的典型体现,也是对“政治进步→文学进步→思想正确与进步→赞扬与肯定”这一评价模式的最好诠释。在这种情况下,凡是与文化革命背道而驰的、塑造工农兵以外的人物的作品,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因为它们政治退步、思想错误。于是,一些作品成了“毒草”,大批作家被迫从文坛消失,甚至很多人遭到了来自政治热情高涨的人们的肉体的、精神的迫害。“政治退步→文学错误→思想错误与退步→批判与否定”,是一个简单至极的推理,却让中国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由此可以窥见,作为左翼文艺运动以来在中国文艺界、甚至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处于领导地位的二元对立的评价模式对1979年以前的当代文学、当代社会及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1976年10月,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发生重要变化,“文革”时代随之宣告结

束。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命题，社会思想解放运动全面开始。文学界适时顺应思想解放的潮流，

“拨乱反正”，结束了文学的“一体化”局面。

我们看到，尽管评价模式上二元对立思想对新时期文学初期有一定影响，但它毕竟已成历史。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陈红旗. “文学是宣传”:左翼文学的本质界定与意识形态泛化[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
- [2]陆咏梅. 论左翼文学的价值取向[J].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 (9).
- [3]毛泽东. 毛主席讲话[R].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5 册[C].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 [4]周恩来.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R].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5 册[C].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 [5]陈思和. 重新审视 50 年代初中国文学的几种倾向[J]. 山东社会科学, 2000, (2).
- [6]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Literary and Artistic Evaluation Model of Dualistic Opposing Thinking

YE Jun-li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is paper inspects the formation of dualistic opposing thinking in the Left-wing Literary and Art Movement and model formation of the dualistic opposing thinking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valuation.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the Left-wing Literary and Art Movement puts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to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hich is no way to shake off.

Key words: Literature; Politics; Literary Evaluation; Dualistic Opposing Thinking; Model

(责任编辑：张俊之)